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碩士論文大綱

指導教授：黃智聰博士

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決定因素

研究生：歐陽宏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

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決定因素

中文摘要

自 1978 年中國開始其「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政策以來，吸引外資變成其推動經濟成長的重要手段之一。自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再一次宣示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由於開放經濟政策更為明朗，越來越多的國家對中國直接投資。自此，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外資投資國之一。甚至在 2002 年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外資接受國。如此多的國家對中國展開大規模的投資，其投資的規模確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以 1993 至 2002 年世界各國對中國投資的追蹤資料，搭配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探討以下問題。一、分析與瞭解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的趨勢，以及比較各國間的差異；二、探究影響世界各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三、對目前台灣大量的對中國直接投資的趨勢，提供具體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中國、外來直接投資、固定效果模型、決定因素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bstract

Since 1978, China has adopted the so-called “open door policy”,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s to facilitate its economic growth. Moreover,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rip in 1992 made a clear announcement of “constructing a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system”. Since then more and more foreign countries have invested tremendous amount toward China due to a more transparent policies and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favorable countri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Furthermore, China was the biggest FDI recipient all over the world in 2002. Many countries invest in China, however, their size of investment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us to investigate the following issues based upon the world-wide official national-level panel data for many countr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3-2003 provide by UN and World Bank and fixed-effect model: 1. Understanding the trend of FDI in China from all foreign countries during 1993-2002 and comparing the amount of FDI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2. Investiga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from different foreign countries in China. 3. Providing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to the issue of huge amount of investment toward China from Taiwan.

Keywords: China, Fixed-Effect Mode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terminants

目 次

壹、研究背景、目的與架構	1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1
二、研究架構	6
貳、相關文獻回顧	8
一、外商直接投資理論	8
二、中國各地區吸引外資之相關文獻	10
三、世界各國投資中國之相關文獻	11
參、預計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13
一、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13
二、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	19
三、預計研究流程與執行進度	21
肆、預期具體成果	24
一、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24
二、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24
參考文獻	25

表 次

表 1：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政策演變	3
表 2：中國主要外來投資國家之投資金額	5
表 3：實證變數之基本統計量	20

圖 次

圖 1：中國外來直接投資趨勢圖（1985-2003）	4
圖 2：研究進行流程圖	22
圖 3：執行進度甘梯圖（2005 年 1 月至 6 月）	23

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決定因素

壹、研究背景、目的與架構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於面臨著資金不足和技術落後的問題，以致於在 1978 年確立改革開放政策，企圖透過利用外資的手段來加速工業化及促進產業升級。也就是期望能利用外資投資來推動國內生產要素的投入，讓國外資本利用於國內資本形成實現國家經濟成長。¹另一方面，中國也想要藉由外資企業產品的出口，來賺取更多的外匯。事實證明，外資直接投資先進的操作和經營技術，不但為中國帶來經濟成長的動力，而且也加速了舊企業的改造。在 1994 年之後外資企業的產品出口每年度都有大幅的增長，外資企業已經由增加稅收轉變為在創匯上的一個重要新力量。因此，Huang (1995) 指出，外國投資在中國的現代化和經濟改革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黃智聰、潘俊男(2002)也指出，外資對中國除了有增加稅收、增加利得等直接效果之外，還會對市場結構產生影響，導致廠商調整其行為進而產生績效的變化等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Huang (2004) 進一步指出，不同來源的外資對中國製造業所產稱的外溢效果並不相同。凡此種種，皆證明外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由前述可知，引進外資在中國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自改革開放以來，吸引外來直接投資的政策就不斷的提出。根據黃智聰、高安邦、余姿瑩 (2004)，回顧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吸引外資政策可分為四個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 (1979~1984) 的「外資起步試點階段」，中國政府於 1980 年在南部沿海地區設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 4 個經濟特區。1984 年，

¹ 中國於 1979、1986、1988 年先後頒佈《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三項是吸引外資的基本法律。另外，於 1991 年通過《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合資、獨資及合營之「三資企業」所得稅徵收細則。中國希望利用外資藉以彌補國內資金不足，擴大出口以賺取外匯，引進國外技術及促進產業升級，改善交通、能源、原材料等經濟發展的瓶頸。

接著在沿海地區設立了 14 個開放城市。此時，中國也開始建立起一套對外商投資進行管理的法律體系，但由於此階段的法律制訂暫屬實驗試探的性質，以致於吸引的外資並不多。在第二階段（1985~1991）的「外資投資發展階段」，中國國務院在 1985 年決定開放長江、閩南及珠江等三個三角洲。1988 年又開放了遼東半島、膠東半島，1990 年將濟南市加入沿海經濟開放區，自此五大開放區從南至北形成沿海帶狀開放地帶。而後，允許外商興辦第三產業、金融和商品零售業，並允許外商從事轉口貿易和開設外資銀行，此舉並奠定了對上海浦東新區開發的基礎。此六年間，中國的投資環境得到大幅的改善，外資的投入也開始加快。在第三階段（1992~1995）的「外資投資快速發展階段」，鄧小平在 1992 年南巡後，外國投資者對中國市場開始具有較多的信心。同時，在以製造業為優先發展的策略下，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也有很大的變化。在第四階段（1996~2004）的「積極引導外資投入西部地區」，中國為了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1996 年 3 月中國具體提出應完成東北地區、環渤海地區、長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中部五省、西南和華南部分省區、西北地區、東南沿海地區等七大經濟區域的開發構想。中國政府期望七大經濟區域能展現自身的特色與優勢，使得外資選擇投資區位時能考慮往西部地區，進一步帶動全面均衡發展，避免因各地區貧富差距過大而產生的社會問題。此外，為了因應加入 WTO 的需要，大多數服務業項目也開始有條件地對外開放。此外，中國亦對外商投資政策進行多項修訂（例如，修正《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使得 2002 年之後外資投資增長速度更為快速。有關中國吸引外資政策的沿革，彙整列於表 1。

圖 1 提供了中國自 1985 年以來，各年的外來投資的實際金額與協議金額。由圖 1 可知，中國的外來投資的實際金額自 1985 年以來逐年攀升。事實上，在 1992 年以前，外資投資中國的金額並不大。但自 1992 年起，中國吸引外資進入高速成長階段。根據圖 1 的資料，1993 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約為 1992 年的 2.50 倍。這顯示出，自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在中國政府的持續開放政策宣示

表 1：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政策演變

階段	年度	重要事件與政策
第一階段	1978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的施政方針。
	1979	通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在廣東與福建兩省規劃設立四個經濟特區。
	1980	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批准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
	1983	公布《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與《關於台胞到經濟特區投資的特別優惠辦法》，給予稅捐減免、開放部分內銷市場以及土地使用優惠減免等。
	1984	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及海南島，並發布《國務院關於經濟特區和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減徵、免徵企業所得稅和工商統一稅》的暫行規定。
第二階段	1985	開放長江和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帶為經濟開放區。
	1986	國務院通過《外資企業法》並頒布《關於鼓勵外商的投資規定》，給予外資更多保障與優惠。
	1988	公布《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與《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並將海南行政區升格為省，成為全國第五個經濟特區。
	1989	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美、日等國宣布對中國經濟經濟制裁。同時中國開始嚴格執行經濟緊縮政策。
	1990	國務院宣布開發上海浦東新區，修改《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並制訂《鼓勵華僑和香港澳門同胞投資的規定》；波斯灣戰爭爆發。
第三階段	1992	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南巡倡導「加速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提出沿海、沿江、沿邊的三沿經濟發展策略，外商到中國投資再度掀起高潮。
	1993	開始實行「宏觀調控措施」，各開發區的設立審批權及終於國務院。
	1994	實施外匯體制改革，人民幣改採單一浮動匯率，並頒布《關於加強外商投資管理工作的各項規定》。
	1995	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外經貿部聯合頒布《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並發布《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
	1996	中國「外經貿部」公布《關於設立中外合資對外貿易公司試點暫行辦法》；取消外商在投資總額內進口設備免徵關稅和增值稅的優惠措施。
第四階段	1997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人民幣堅挺削弱出口競爭力；修正《外商直資產業指導目錄》。
	1998	恢復外商企業機器設備進口關稅和增值稅減免的優惠政策。
	1999	頒布《外商投資商業企業試點辦法》，擴大外商投資領域。
	2000	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提交提案，提請審議《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三個法律修正案草案。草案大幅度削減對三資企業的限制性規定。
	2001	七月擴大外商進出口經營權。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發布《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辦公廳關於擴大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經營權有關問題的通知》。
	2002	四月正式實施《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原先禁止外資進入的電信、燃氣、熱力、給排水等行業列為對外開放領域；同時廢止國務院批准，國家計畫委員會、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發布的《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
	2003	中國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中國與香港間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貿易投資便利化三層面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2004	為了促進外國投資者赴中國投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十一月頒布《關於外商投資舉辦投資性公司的規定》，允許外國投資者根據中國有關外國投資的法律、法規及該規定，在中國設立投資性公司。

資料來源：參閱高長（1994）、潘俊男（2001），作者自行更新補充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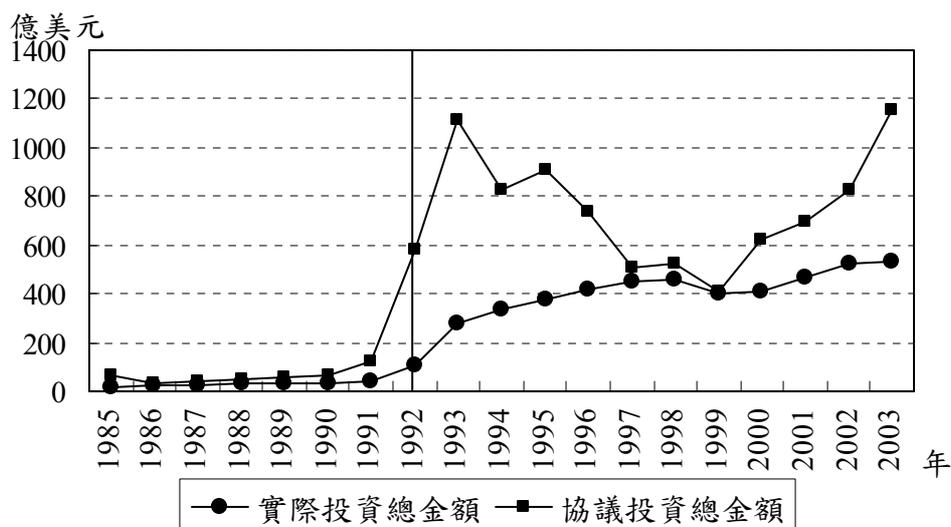


圖1：中國外來直接投資趨勢圖（1985-2003）

下，外資投入規模大幅增長。自 1993 年起，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吸引外資國。在 2002 年時，甚至一躍成為全世界接受外資最多的國家。在 2003 年時，中國的外來投資的實際金額高達 535.1 億美元。

再就各國對中國實際直接投資的金額來看，表 2 列出以 2002 年投資中國最多的 10 個國家(地區)，自 1993 年至 2002 年的實際直接投資金額。這些國家(地區)對中國投資的金額占整體中國外來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由 1993 年的 91.6% 降至 2002 年的 71.9%。由此可略知，中國的外資來源有逐漸分散的趨勢。此外，由表 2 可知，長久以來，香港一直為中國最大的外資來源。雖然，香港投資中國的金額在近年來有些微的下滑（特別是 1997 年後），但仍為投資中國的最大來源。美國自 1998 年以來，成為中國第二大外資來源國。其投資在中國的金額，由 1993 年的 20.6 億美元增加到 2002 年的 54.2 億美元，有逐年攀升的趨勢。日本在 1996 與 1997 年時曾一度為中國第二大外資來源國，但是自 1998 年起為美國取代，降為第三大來源國。台灣在 1995 年以前，一直為僅次於香港的中國第二大來源國。但是，隨著中國的持續開放政策，越來越多的國家至中國投資，到了 2002 年台灣僅為中國的第四大外資來源國。儘管如此，台灣在 2002 年投資於

表 2：中國主外來投資國家之投資金額

(單位：億美元)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香港	172.7	196.7	200.6	206.8	206.3	185.1	163.6	155.0	167.2	178.6
美國	20.6	24.9	30.8	34.4	32.4	39.0	42.2	43.8	44.3	54.2
日本	13.2	20.8	31.1	36.8	43.3	34.0	29.7	29.2	43.5	41.9
台灣	31.4	33.9	31.6	34.7	32.9	29.2	26.0	23.0	29.8	39.7
南韓	3.7	7.2	10.4	13.6	21.4	18.0	12.7	14.9	21.5	27.2
新加坡	4.9	11.8	18.5	22.4	26.1	34.0	26.4	21.7	21.4	23.4
德國	0.6	2.6	3.9	5.2	9.9	7.4	13.7	10.4	12.1	9.3
英國	2.2	6.9	9.1	13.0	18.6	11.7	10.4	11.6	10.5	9.0
加拿大	1.4	2.2	2.6	3.4	3.4	3.2	3.1	2.8	4.4	5.9
法國	1.4	1.9	2.9	4.2	4.7	7.1	8.8	8.5	5.3	5.8
總和	252.1	308.9	341.5	374.5	399.0	368.7	336.6	320.9	360.0	395.0
占全部比重(%)	91.6	91.5	91.0	89.7	88.1	81.1	83.5	78.8	76.8	74.9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各年。

中國的金額，仍高達將近 40 億美元。由表 2 可以觀察到，歐洲國家的德國、英國、法國亦名列於 2002 年中國外資來源前十名的國家。但是，這些歐洲國家對中國的投資金額都相當的少。

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世界各國對中國的投資有如此大的差異，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現有的「對外投資理論」中所提供的原因，多少解釋了這個現象。例如，賺取更多的利潤、具有某些壟斷優勢、節省運輸成本、內部化生產、產品的生命週期等等的原因。也就是說，如果一國相較於他國具有較多上述的考量，則該國向外投資的金額將會比他國來得多。而現有針對外資投資中國的實証研究中，大多是利用現有的「對外投資理論」的原因，探究中國各地區吸引外資的決定因素。也就是研究，為何中國的某一地區較另一地區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外來直接投資（例如，Hsiao and Gastanaga, 2001；Hsiao et al., 2001；Wei, 1995；Chen, 1996；Feng and Zhang, 2000）。僅有少部分的研究，著重在分析世界各國對中國投資金額差異的因素分析。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影響世界各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因素。由前述的分析可知，在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宣佈將堅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便開始急遽的增加。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期間將限定在 1993 至 2002 年之間。利用《中國統計年鑑》與《國際統計年鑑》所提供的中國官方的統計資料，以及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國際勞動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等所提供的，世界各國在此 10 年研究期間的相關變數追蹤資料（panel data），估計固定效果模型（fixed-effect model）。希望藉此研究可以進一步瞭解，決定世界各國投資中國的主要決定因素為何。另外，為了要進一步瞭解地理距離（或可作為文化因素之替代變數）是否為重要因素？利用固定效果模型所估計之各國截距項，再對地理距離進行迴歸估計。²最後，試圖利用多種計量統計檢定指標進行模型正確性之檢定，以確認本文研究結果的準確性。

二、研究架構

本大綱其餘部分的研究架構如下：第二部分回顧過去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文獻。第三部分敘述本文預計的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包括預計採用的研究方法與原因、可能遭遇的困難與解決途徑、研究進行流程以及研究執行進度。最後，第四部分將說明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與貢獻等具體成果。

至於在碩士論文中的組織架構則預計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第二節 預計研究成果與研究架構

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

第一節 外商直接投資理論

²此一文化因素無法至於固定效果模型中進行估計。

第二節 中國各地區吸引外資之相關文獻

第三節 世界各國投資中國之相關文獻

第三章 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歷程與地區與來源分布

第一節 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歷程

第二節 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

第三節 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分布

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資料來源說明

第二節 實證模型介紹

第三節 變數說明與假設

第五章 實證結果分析與檢驗

第一節 實證結果分析

第二節 地理距離因素之探討

第二節 實證模型正確度之檢驗

第六章 結論與政策意涵

第一節 結論

第二節 政策意涵

貳、相關文獻回顧

一、外商直接投資理論

外商直接投資，是跨國企業在國際間組織經濟活動的重要形式。跨國企業通過兩種途徑逐漸形成，除了透過內部逐漸增長，也經由不斷地兼併其他企業而迅速膨脹。有些跨國企業在成長過程中，則是同時透過這兩種途徑。至於跨國企業在尋求增長時，為什麼會選擇跨出國界，以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對外國投資？由於各家見解不同，因此到目前為止，出現許多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其中，最主要的有新古典理論（classical theory）、區位理論（location theory）、Hymer 的無形資產理論（intangible asset theory）、產品生命週期理論（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內部化理論（internalization theory）以及 Dunning 的折衷理論（eclectic theory）等。

在傳統的觀點方面，新古典理論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發生，是因為不同的國家間存在了不同的資本報酬。因此，鼓勵了跨國企業把他們的資本，從低報酬的國家移動到高報酬的國家，以賺取更多的利潤。如此的現象，將會持續直到所有國家的資本報酬都相同為止。然而，到目前為止，新古典理論在實證研究上仍備受爭議。例如，Blais（1975）發現，英國和加拿大在 1971 至 1975 期間流入美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在實證研究上支持新古典理論。但是，Walia（1976）卻發現，美國的資本和相關的資本報酬率間未具有顯著的關係。區位理論則認為，跨國企業為了節省運輸成本，會選擇在接近市場或原料來源的地方設廠投資，從而產生了外商直接投資。Krugman（1991）對該理論提出修正，其指出製造廠商會在考慮到實現規模經濟的情況下節省運輸成本。因此，他們傾向選擇到廠商聚集的地方設廠。

許多學者亦稟持著各自的見解，紛紛對外商直接投資發生的原因提出不同的看法。在 1960 年代，Hymer（1960）提出無形資產理論，其主要論點認為跨國

企業能存在並對外投資，是因為他們具有某些壟斷優勢。例如，專門技術的控制、原料來源的壟斷、對銷售通路的控制、專利、商譽等。跨國企業憑藉這些壟斷優勢，得以克服與當地廠商競爭的不利因素。並進而有效地與當地的廠商競爭或合作，以擴大利潤。Vernon (1966) 則以產品生命週期來解釋外商直接投資發生的原因。他認為一項產品所處的生命週期不同，決定了其生產地的不同，而外商直接投資則是生產過程或產地轉移的必然結果。新產品 (The New Products) 一般是為了滿足高收入國家選擇性極強的市場而產生，由於尚處在成長期間，需要不斷從市場得到訊息反饋以改進其性能，因此生產基地多接近市場，即高收入的發達國家。成熟產品 (The Maturing Products) 價格逐漸下跌，其他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對於新產品的需求亦隨而擴大。因為先進國家的勞動成本較高而逐漸將生產據點轉移到勞動成本較低廉的其他國家生產。至於標準化產品 (the Standardized products) 在市場上的競爭是取決於價格的優勢，對於勞力密集的產品，先進國家已不具競爭力，因此將產品的生產轉移到落後國家，外商直接投資也於是由這些移轉過程中產生。

至於 1970 年代，Buckley and Cassons (1976, 1981) 提出的內部化理論則強調，外商直接投資起源於跨國企業的內部化生產。企業雖然可在市場上購買到所需的服務或產品，然而不同的國際市場效率不一，交易成本迥異且可能存在過高的風險。當跨國交易的成本高過某一水平後，企業就不免考慮要自行透過成立部門或子公司，將外購行為及外部性活動 (如生產、採購、行銷、研發、人員培訓等) 加以內部化，來滿足原來可在市場上購得的需求。因此，為了達到內部化的目的，跨國企業會到國外設立分公司，進而產生了外商直接投資。

以上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皆從各自單一的觀點切入，然而也有學者提出外商直接投資的發生是在許多因素下綜合而成的。Dunning (1993) 即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產生原因錯綜複雜，並非單一的理論所能解釋，因此他集前述各家之長，提出折衷理論 (Eclectic Theory)。該理論抽象出三個決定外商直接投資的最

基本要素：(1) 所有權優勢 (Ownership Advantage)；(2) 區位優勢 (Location Advantage)；(3) 內部化優勢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³在這三種優勢的綜合作用下，廠商會進行跨國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也由是產生。

二、中國各地區吸引外資之相關文獻

在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方面，目前的相關文獻主要可分為兩個取向探討。第一個取向多以中國各年各地區為樣本，研究中國各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而另一個取向則多研究世界各國的跨國企業為何捨棄母國投資環境，而逕赴中國進行外商直接投資的原因。其中大多數相關研究都參考前述各項外商直接投資理論，以綜合各理論的方式，分析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之決定因素為何。

在第一個取向方面，Cheng and Kwan (2000) 以動態追蹤資料迴歸模型 (dynamic panel regression model) 研究 1985 到 1995 年間，影響中國二十九個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其研究結果顯示，一個區域若有較大的市場市場、良好的基礎建設、以及優惠政策會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有正面的影響，但高工資則會有負面的影響。而 Coughlin and Segev (2000) 則採用空間相依 (spatial dependence) 的假設進行 OLS 分析，以驗證中國的一個省或地區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是否會受鄰近的省或地區所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具有外溢效果。此外，亦發現一個省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其市場大小、平均生產力、以及臨海與否與呈正向關係；而與其平均工資與文盲率成負向關係。

此外，在不同的時期鑑於不同的時空環境，亦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不同。Sun et al. (2002) 以 1986 年到 1998 年間中國的三十個省市地區為樣本，用固定效果的追蹤資料模型，分析各省市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其分析結果顯示，決定因素隨時間而變動。這顯示，1991 年前後各省的外

³ 故 Dunning 的折衷理論又稱為 OLI 理論 (取 Ownership、Location，以及 Internalization 之縮寫)。

商直接投資因素並不相同，但勞工素質、基礎建設、政治的穩定情況、及開放程度，都是吸引外商前往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此外，該研究也得到沿海省分較中西部省分更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結論。

以上列舉之文獻，皆由中國各省市地區投資環境的比較著手，並探討出許多一致性的結果。然而，也有部分學者由中國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比較切入，並得到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不一致之結論。林俊儒（2003）在其碩士論文中，透過一般最小平方法，將中國分為東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區以進行估計。其研究結果顯示，東部地區係以市場區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並具有較高的固定效果；而中西部地區則以生產區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例如，低廉的勞動成本以及地方基礎建設等。因此，兩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原因完全不同。Kuo and Huang（2003）則從區域的觀點切入，採用固定效果的動態追蹤資料模型，解釋 1996 年至 2000 年中國二十八個省市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在將中國分為沿海與內陸兩大地區進行比較後，研究結果顯示，平均工資對沿海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負向關係。而在內陸地區，累計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及代表開放程度的出口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則對其外商直接投資額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三、世界各國投資中國之相關文獻

至於第二個取向方面，若由資料的型態作區分，使用時間序列資料（Time Series Data）分析的有 Wang and Swain（1995）以及 Zhang（2000）。其中，Wang and Swain（1995）採用單一方程模型（One-equation Model），以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估計 1978 年至 1992 年間匈牙利和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地主國（host country）的市場大小、資金成本、政治穩定性、匯率以及勞動成本都是影響中國外商直接投資額的顯著因素。Zhang（2000）則是透過相關需求模型（relative-demand model）解釋 1979 年至 1997 年間，中國吸引美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吸引美商

和港商直接投資的因素並不相同：美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受接近市場所驅動，而港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則是為了達到出口的目的。

Liu et al. (1997)、Dees (1998) 以及 Wei and Liu (2001) 則由追蹤資料 (panel data) 著手研究。Liu et al. (1997) 將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區分為合同的外商直接投資 (pledged FDI)，和實際的外商直接投資 (realized FDI) 兩種。其以隨機效果 (random effect) 的追蹤資料模型分析，1983 年至 1994 年間 22 個國家在中國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資，以及 1984 年至 1994 年間 17 個國家在中國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資。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雙邊貿易額、文化差異、相對市場大小的變化、工資率和匯率都是影響中國合同外商直接投資的顯著因素；而影響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的顯著因素則為雙邊貿易額、工資率和匯率。Wei and Liu (2001) 並以 Liu et al. (1997) 的文章為依據，更新資料並在文中做更進一步的檢定。Dees (1998) 雖然也採用追蹤資料，但他卻使用誤差修正模型分析 (error correction model) 進行分析，得到影響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為市場大小、相對工資和開放程度之結果。

至於 Hong and Chen (2001) 在文章中，並用時間序列資料與追蹤資料，套用 Dunning 的折衷理論，來分析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其認為，跨國企業獨占的科技與管理經驗優勢，加上中國低廉的勞動成本和巨大的潛在市場，可能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此外，運用中國內部的市場建立國際生產網絡的目標也可能是重要的吸引因素之一。其餘的重要因素還包括人民幣的貶值、距離、文化和跨國企業全球性的佈局策略。

參、預計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一、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一) 本研究之資料來源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研究世界各國至中國進行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本研究將焦點置於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外商直接投資開始蓬勃發展的時期。因此，預計涵蓋年份從 1993 年到 2002 年，共 10 年的資料。至於追蹤對象方面，過去的研究多僅挑選數個國家為研究標的。因此，到目前為止，僅 Wei and Liu (2001) 研究中國 1983 至 1998 間的合作外商直接投資因素時，涵蓋 87% 的所有直接投資額，以及 1984 年至 1998 年間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因素時，涵蓋 88% 的所有直接投資額為涵蓋範圍比率最高的研究。本文為求研究資料的最大涵蓋範圍比率，擬尋找全球所有有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國家之變數資料，希冀能估計出結果為最趨近全體母體的估計值。儘管這樣的作法極耗人力、物力與時間，但若能將外商直接投資的範圍比率，盡量提高趨近到 100%，則作出來的研究也將為最接近事實的估計值。

在整合上述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與相關實證文獻後，並逐一檢討各項可能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決定因素後，本研究由國家特性比較的觀點，歸納出可能影響世界各國到中國進行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並加以驗證。在所有可能原因之中，投資國 (home country, 指資本輸出國) 和地主國 (host country, 指資本輸入國) 間的相對國內生產毛額、相對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相對工資、雙邊貿易規模、相對匯率、相對借貸成本、相對投資風險以及彼此的地理距離，都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重要指標客觀因素，反映了投資國和地主國間的相對國家特性。由於所有的變數，包含世界各國的資料，因此本研究的變數資料來源較為複雜，故每一變數的預計的資料來源，將分述如下。

各投資國對中國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以及貿易總額來自於《中國統計

年鑑》；各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匯率以及借款利率來自於中國國家統計局出版的《國際統計年鑑》以及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出版的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各國工資率來自於國際勞動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出版的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以及其網站上的資料庫⁴。由於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以製造業為主，因此找各國工資率資料時，選定的是製造業的工資率；國家風險的資料來自於 *Institutional Investor* 期刊每年對各國風險的評分，其評估所需的資訊來自於 senior economists and sovereign risk analysts 此一涉略全球銀行、金融管理與安全之機構；⁵至於各投資國到中國的地理距離定義為，由中國首都北京市到各國首都的距離，該資料可在 BALI & INDONESIA ON THE NET 網站上獲得。⁶

在所有國家或地區之中，以台灣的資料最為特別。因為政治因素，使其許多項資料在以上提到的各資料來源中從缺。因此，有關台灣的資料，主要是根據台灣政府所提供的官方資料為主。以上各變數都以國內生產毛額平減指數，或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成以 1993 年為基期的價格，以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

（二）本研究之實證模型

本研究計畫預計使用結合橫斷面（cross-sectional）與時間序列（time-series）結合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其優點是相較於橫斷面與時間序列兩種資料，追蹤資料包含更多的資訊。不但有助於提高樣本數與自由度，使估計結果較為準確；而實證模型的採用也將更具有更多的選擇。在綜合以上各重要變數假設的探討後，本文可設出下列的關係式：

$$FDIR = f(GDP, GDPPC, WAGE, EXIM, EXR, RBC, RCR) \quad (1)$$

⁴ 國際勞動組織網站為 <http://laborsta.ilo.org/>。

⁵ 其對各國國家風險的評定由 0 分到 100 分，分數越高，發生金融危機的機率便越小。

⁶ BALI & INDONESIA ON THE NET 的網站為 <http://www.indo.com/distance/>。

第 (1) 式中， $FDIR$ 為每年各國在中國的實質直接投資額， GDP 為每年中國和各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之比率， $GDPPC$ 為每年中國和各國實質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之比率， $WAGE$ 為每年中國和各國實質工資率之比率， $EXIM$ 為每年中國對各國的雙邊貿易規模， EXR 為每個時期中國和各國實質匯率之比率， RBC 為每年中國和各國實質借款利率之比率，而 RCR 則為每年中國和各國國家風險之比率。第 (1) 式可以進一步表示為：

$$LFDIR_{it} = \beta_{0i} + \beta_1 GDP_{i(t-1)} + \beta_2 GDPPC_{i(t-1)} + \beta_3 WAGE_{i(t-1)} + \beta_4 LEXIM_{i(t-1)} + \beta_5 EXR_{i(t-1)} + \beta_6 RBC_{i(t-1)} + \beta_7 RCR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2)$$

第 (2) 式中， L 表示取自然對數 \log 後的值， i 表示國家或地區， t 代表時期，至於 ε ，則為殘差項。此外，由於各投資國可能存在各別特質，使各投資國的跨國企業在中國進行直接投資時產生不同的總直接投資額。為了衡量這些個別特質的型態，因此本研究在估計的實証模型中，加入各投資國的個別效果 (national-specific effect) β_{0i} 。因此，第 (2) 式的實証估計模型為固定效果 (fixed effect) 模型。若假設這些個別特質效果，是以隨機變動形式來影響各投資國在中國的總直接投資額。也就是說， $\beta_{0i} = \bar{\beta}_0 + \nu_i$ ， $\nu_i \sim iid(0, \sigma_\nu^2)$ 。則實証估計模型，將改為隨機效果 (random effect) 模型。至於使用哪種模型來估計較為適當，本研究將以 Hausman (1978) 的方法檢定。檢定統計量為：

$$H = (b_{fix} - b_{ran})'(M_{fix} - M_{ran})^{-1}(b_{fix} - b_{ran}) \quad (3)$$

第 (3) 式中， H 統計量呈 χ^2 分配。而 b_{fix} 與 b_{ran} 分為固定係數與隨機係數的參數估計值， M_{fix} 與 M_{ran} 分別為其共變異矩陣。設立虛無假設與對立假設分別為： $H_0: \nu_i=0$ ，即 ν_i 與解釋變數間不具相關性； $H_A: \nu_i \neq 0$ ，即 ν_i 與解釋變數間具相關性。若虛無假設為真，即 b_{fix} 、 b_{ran} 的估計無太大差異，則選擇隨機效果模型；反之，若 ν_i 與解釋變數間具相關性，則應選擇固定效果模型為佳。

最後，為了瞭解第（2）式中的截距項，是否與地理距離有關聯，本文另設以下實証模型：

$$\hat{\beta}_{0i} = \alpha_0 + \alpha_1 LG\text{EOD}_i + u_i \quad (4)$$

在第（4）式中， u 代表該式的殘差項；GEOD 表示各投資國和中國的地理距離。之所以將（2）式中的截距項與各投資國和中國的地理距離單獨提出作迴歸分析，主要是因為如此將可進一步瞭解，各投資國對中國的自發性直接投資（autonomous investment）狀況與地理距離是否有關。即可研究即便是在誘發性投資（induced investment）為零的情況下，為何有些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仍特別多。

（三）本研究之變數假設

由前所述，投資國和地主國間的相對國內生產毛額、相對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相對工資率、雙邊貿易規模、相對匯率、相對借貸成本、相對國家風險以及彼此的地理距離，都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重要指標客觀因素。以下針對上述幾項的變數，加以詳細說明其對於投資國對地主國進行投資的影響。

投資國和地主國間的相對國內生產毛額，具有有兩層的意義。首先，它代表了相對的市場大小。一國的國內生產毛額越高，代表了其潛在市場越大。由於，投資國的廠商赴地主國進行直接投資時，也會著眼於地主國市場的大小，以利產品的銷售。因此，本文假設地主國國內相對的市場越大，對投資國尋求市場的廠商吸引力也越大，地主國所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也會越大。Wang and Swain（1995）、Liu et al.（1997）、Wei and Liu（2001）等對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實證研究，皆支持了該觀點。而 Pitelis（1996）則認為，投資國國內需求的不足，導致其廠商不得不對外進行直接投資以擴張市場規模。因此，投資國國內市場的大小與地主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具有負向關係。

而從另一方面來看，投資國的國內生產毛額越高，也代表了該國具有較多的大型企業，這些大企業具有較多的所有權優勢（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可以從事對外直接投資。故投資國的國內生產毛額規模可視為擁有大型企業多寡的代理變數。Ajami and BarNiv（1984）對美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也證實了此項關係。因此，投資國國內生產毛額規模越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也會越大。綜合以上兩個觀點，投資國和地主國間的相對國內生產毛額，對投資國對地主國進行投資的影響並不確定，端視兩正負影響力間的強弱而定。

此外，投資國對地主國的相對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代表了投資國和地主國間的相對經濟發展程度。通常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其國內大型企業的數量也會較多。如前所言，投資國國內大型企業越多，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就越強。故本文假設，投資國人均國內生產毛額越大，對外直接投資也會越多。

而在所有生產要素成本中，相對工資的高低是極重要的一項考量因素。特別是對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而言，更是如此。Lucas（1993）指出，一國工資率的提高會促使該國生產成本提高，進而降低該國所吸收到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反之亦然。這種工資率和外來直接投資間的負向關係，也在許多研究中被證實。例如，Moore（1993）、Kumar（1994）、Wei and Liu（2001）、Wheeler and Mody（1992）皆得到類似的結論。因此，本文假設地主國相對的工資率越低，其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也就越大。

另一項重要的可能決定因素為投資國和地主國間的雙邊貿易規模。就目前而言，該項因素對地主國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影響，仍有爭議。Wei and Liu（2001）指出，投資國與地主國間的雙邊貿易額越高，流入地主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額也越大。其理由是，當雙邊貿易規模越大的時候，也代表了投資國和地主國間的關係越密切，而使得投資國的廠商在地主國的市場上能獲得更充分的訊息，進而擁有更多的投資機會。另外，地主國的進口額有部分為外商從其母國的基地進口機械或材料等；相反的，出口額也有部分代表了外商在地主國的新投資廠，回銷成品

或半成品回投資國。這樣的關係，在高度開發國家向開發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時更是常見。⁷如果由上述的理由推論，亦可得到雙邊貿易規模越大，則投資國流入地主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也會越大的推論。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雙邊貿易規模和地主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額也可視為互補關係。Jeon (1992) 指出，地主國進口額的成長暗示了關稅或貿易障礙的降低，如此會導致其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暫時性降低。因此，地主國的進口規模和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間具有負向關係。對一家投資國的跨國企業來說，它能藉出口或是對外直接投資擴張其市場規模。關稅越高，出口的成本就越貴，它以對外投資的方式擴張市場規模的意願也就越大。綜合上述，本文假設投資國與地主國間的貿易規模，對地主國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影響尚不確定。

相對匯率的變動，藉由許多方式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Froot and Stein (1991) 認為，國際間各主要貨幣價值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各國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價值的短期波動。這種波動一方面會導致企業在國內外融資成本的變化，另一方面會導致企業財富儲量的短期變化。換言之，投資國匯率的相對攀升（即貶值），會使得投資國廠商的資產隨之降低，因而降低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即投資國流入地主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也會跟著減少，反之亦然。Cushman (1985, 1987) 和 Culem (1988) 則基於另一個觀點指出，地主國貨幣貶值使投資國廠商在每單位的本國幣下能雇用更多的勞動力。因此，會促成地主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綜合以上所述，本文假設，投資國的貨幣相對於地主國升值時，將會增加對地主國的外商直接投資。

相對借貸成本，也是討論外商直接投資理論中常被探討的變數。Aliber (1970) 認為，由於外商直接投資的資金通常來自於投資國，若投資國的借貸成本相對小於地主國，則將降低投資國廠商所須付出的成本，使得他們更樂於以外

⁷例如，台灣廠商到中國進行直接投資時，運送生產財過去進行生產，再把半成品運回台灣加工，或回銷消費財，便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

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向地主國投資。同樣的觀點在實證研究中，也為 Pain (1993, 1997)、Barrel and Pain (1996)、Grosse and Trevino (1996) 以及 Wei and Liu (2001) 等人所證實。因此，本文假設地主國相對於投資國的借貸成本越高，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也越多。

就一般所觀察到的現象而言，投資者都會趨向於避免不確定性或風險。因此，地主國與投資國相較之下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越穩定，外商在地主國市場上所能得到的資訊就越多，其所承受的風險也就越小，外商也越敢放心對地主國進行投資，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也趨越大。Wei and Liu (2001) 使用 1983 年至 1998 年銀行破產風險衡量中國的國家風險時發現，外商直接投資顯著地與國家風險呈負向關係。然而，在 Korbrin (1979) 和 Tallman (1988) 中，此項關係並未被證實。而 Grosse and Trevino (1996) 則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家風險間僅具有微弱的負向關係。

投資國與地主國間的地理距離，也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地理距離的遠近不僅影響運輸成本，也影響了管理成本，所以地理距離越遠，運輸成本和管理成本越高。Solocha and Sokin (1990, 1994) 和 Davidson (1980) 指出地理距離的接近能夠減少訊息和管理上的不確定性，減少監視成本並降低廠商的風險。另外，投資國與地主國間的地理距離，亦可以用來作為兩國文化差異的替代變數。而文化差異越大，所代表的亦是訊息和管理上的越不確定性。因此，本文假設投資國和地主國地理距離越遠，地主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也越少。各項實證變數的說明與基本統計量均彙整列於表 3 之中。

二、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

- (一) 本研究所使用的實證模型中，部分解釋變數可能具有內生化的特性。此一內生化的問題，將導致估計結果產生偏誤。因此，除了在實證模型中採用前一年的解釋變數資料外，若資料許可，也將尋求其它模型進行估計。並將估計結果做一比較，以確認本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的正確性。

表 3：實證變數之基本統計量

變數	變數說明	平均值	標準差	預期影響方向
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	每年各國在中國的實質直接投資額（單位：百萬美元）	1008.61	2706.6	
相對國內生產毛額	每年中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各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70.42	231.93	?
相對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每年中國實質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各國實質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0.25	0.49	+
相對工資率	每年中國實質工資率/各國實質工資率	0.17	0.28	-
雙邊貿易規模	每年中國對各國之進出口總額（單位：百萬美元）	7947.31	13903	?
相對匯率	每年中國實質匯率/各國實質匯率	20.43	44.41	+
相對借貸成本	每年中國實質借款利率/各國實質借款利率	-5.23	9.38	+
相對國家風險	每年中國國家風險評分/各國國家風險評分；其對各國國家風險的評定由 0 分到 100 分，分數越高，發生金融危機的機率便越小。	1.13	0.89	-
地理距離	各國家（地區）首府到中國首都北京市之距離（單位：公里）	8267.19	4711	-

資料來源：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以及進出口總額來自於《中國統計年鑑》；各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匯率以及借款利率來自於中國國家統計局出版的《國際統計年鑑》以及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出版的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各國工資率來自於國際勞動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出版的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以及其網站上的資料庫。由於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以製造業為主，因此找各國工資率資料時，選定的是製造業的工資率；國家風險的資料來自於 *Institutional Investor* 期刊每年對各國風險的評分，其評估所需的資訊來自於 senior economists and sovereign risk analysts 此一涉略全球銀行、金融管理與安全之機構；至於各投資國到中國的地理距離定義為，由中國首都北京市到各國首都的距離，該資料可在 BALI & INDONESIA ON THE NET 網站上獲得。至於台灣的相關資料，則來自於其政府出版的官方資料。

- (二) 本研究中，由於部分鄰近的投資國間條件相仿，所以彼此間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可能有某種程度的關係性。因此，可能產生統計上自我相關的問題，也就是產生 $Cov(e_i, e_j) \neq 0$ 的情況。因此，有必要對此一假設進行檢定，而後再決定是否針對實証模型進行修正，以確保本研究的研究結論可信度。
- (三) 另外，本研究採用各投資國的追蹤資料（1993 至 2003 年）進行估計。長時間的追蹤資料，將使得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呈現出長期的現象，而非只是提供短期結論。但由於本研究觀察年數長達 10 年，且所研究的樣本包含在中國投資的世界各國，所以相關資料的操作與搜尋可能相當費時與困難。

三、預計研究流程與執行進度

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目的是要探討世界各國直接投資中國的決定因素為何？因此，在探討完研究目的後，本研究即分別對外商直接投資理論、中國各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文獻，以及世界各國對中國直接投資文獻三方面的相關文獻加以整理分析，並探討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歷程、分佈與來源。

接著，將建立世界各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經濟理論模型。研究資料的蒐集、基本統計分析，以及計量模型之建立也都將在這一時程中完成。之後並探討影響世界各國對中國投資之 fixed-effect 模型估計，分析並解釋估計結果，以瞭解影響世界各國直接投資中國的決定因素為何。並進一步分析，地理距離（或可作為文化因素之替代變數）是否是造成各國投資中國差異之主要因素。各項必要的檢驗結果也將被說明於此。

最後，本研究將總結研究結論，並敘述政策意涵。本研究預計的進行流程及執行進度可由圖 2 與表 3 清楚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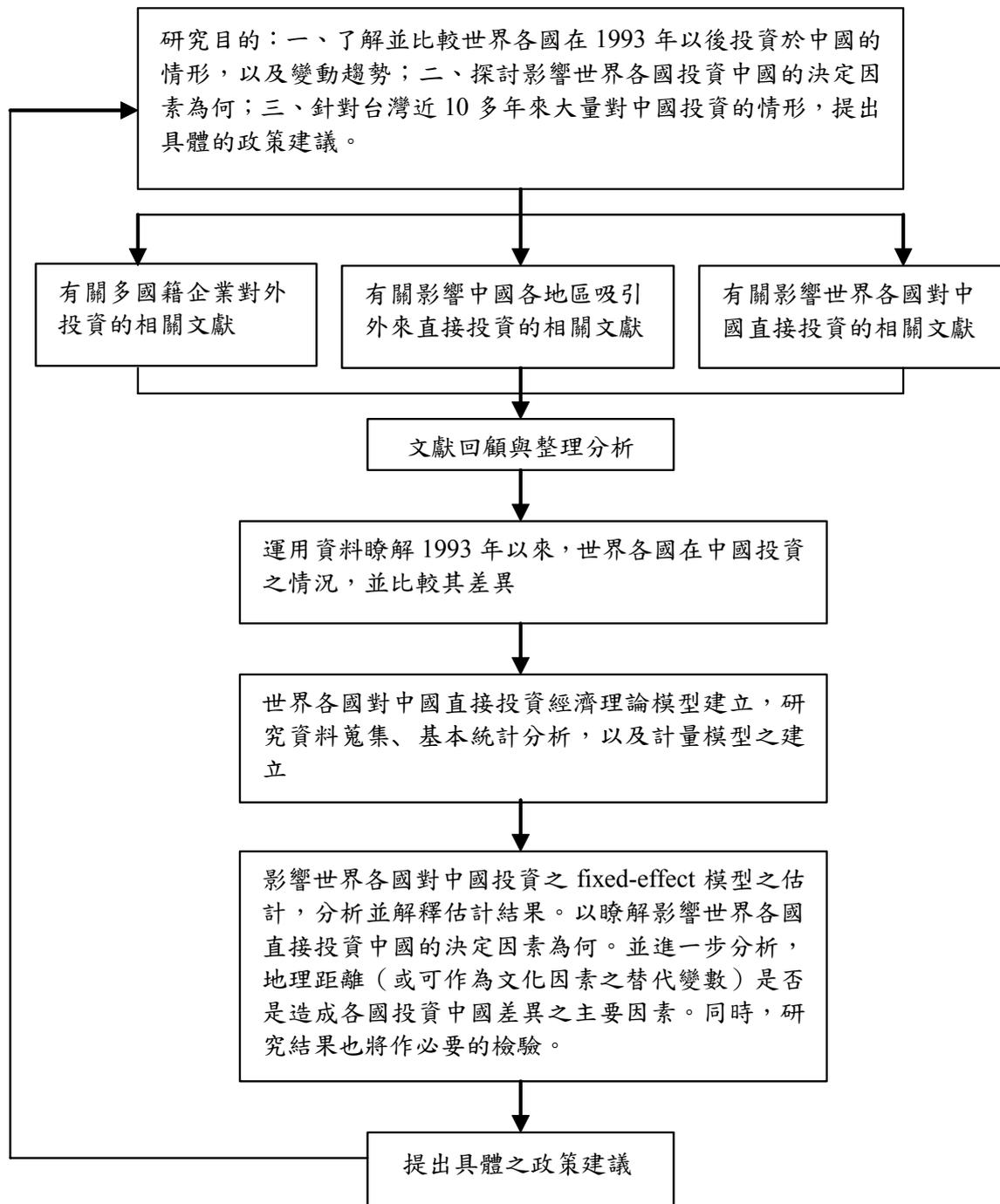


圖 2：研究進行流程圖

表 3：執行進度甘梯圖（2005 年 1 月至 6 月）

工作項目	月次						備註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1. 相關文獻之蒐集與回顧	←→						
2. 理論模型的建立		←→					
3. 實証資料之蒐集			←→				
4. 實証模型測試與估計				←→			
5. 碩士論文初稿及發表					←→		
6. 完成碩士論文						←→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肆、預期具體成果：

一、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 (一) 本研究將更深入整理與回顧國內外有關於對外投資的理論、影響中國各地方吸引外資的決定因素之相關文獻，以及世界各國投資中國的決定因素。
- (二) 除了盡可能建立一個理論與實証模型架構外，本研究並提供 1993 年以來世界各國對中國投資的資料，以了解其趨勢與各國之間的差異。
- (三) 在實証模型上，將利用固定效果 (fixed-effect) 模型捕捉世界各國的特質因素，探討世界各國投資於中國的決定因素。
- (四) 利用固定效果模型所估計之各國特質效果 (individual-specific effect)，對各投資國與中國之地理距離進行迴歸估計，以進一步釐清地理距離 (或可作為文化因素之替代變數) 在對外投資的決策上所扮演的角色。
- (五) 最後，試圖利用多種計量統計檢定指標進行模型正確性之檢定，以確認本計畫之研究結果的準確性。

二、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研究成果除了做為國際學術論證之用外，亦可提供台灣在思考面對大量台商對中國投資此一問題上做為參考。並且，希望能有助於台灣，在制訂台商對中國投資相關政策以及吸引外資政策時，對世界各國投資中國之決定因素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參考文獻

- 林俊儒 (2003), 《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之決定性因素實證》。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財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 高長 (1994), 《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黃智聰、高安邦、余姿瑩 (2004), 「外來投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分佈不均度之分析」, 《中國大陸研究》(台北), 47 (2), 頁 33~56。
- 黃智聰、潘俊男 (2002), 「大陸地區製造業產業結構的決定因素」, 《中國大陸研究》(台北), 45 (2), 頁 97~123。
- Ajami, R. A. and R. BarNiv (1984), "Utilising Economic Indicators in Explain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4(4), 16-26.
- Aliber, R. Z. (1970), *A Theor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Kindleberger, C. P. (e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arrell R., N. Pain, and F. Hubert (1996), "Regionalism, Innov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German Direct Investment." NIESR Discussion Paper, 91.
- Blais, J. P. (1975),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anadian and British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Dissertation. Pittsburgh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Buckley, P. and M. Cassons (1976), *The Futur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London: Macmillan.
- Buckley, P. and M. Cassons (1981), "The Optimal Timing of 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Journal*, 91, 75-87.
- Chen, C. H. (1996), "Reg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3 (2), 18-30.
- Cheng, L. K. and Y. K. Kwan (2000), "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hina Exper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1, 379-400.
- Coughlin, C. C. and E. Segev (2000),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Spatial Econometric Study." *The World Economy*, 23, 1-23.
- Culem, C. G. (1988), "The Locational Determinant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 Among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2), 885-904.
- Cushman, D. (1985), “Real Exchange Rate Risk, Expectations, and the Level of Direct Investm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7(2), 197-308.
- Cushman, D. (1987), “The Effects of Real Wages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outhern Economics and Journal*, 54, 174-185.
- Davidson H. W. (1980),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tivity: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Effe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2, 9-22.
- Dees, S. (1998),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Economics of Planning*, 31(2-3), 175-194.
- Dunning, J. (1993),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Workingham, England and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 Feng, Y. and H. Zhang (2000), “Provincial Distribution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A Pooled Time-Series Empirical Study.” In Chen, Baizhu, J. Kimball Dietrich, and Yi Feng (eds.), *Financial market reform in China: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Series.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401-424.
- Froot, K. and J. Stein (1991),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Approa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1191-1217.
- Grosse R. and L. J. Trevino (1996),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nalysis by Country of Orig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7(1), 139-155.
- Hong, M. and L. S. Chen (2001), “Quantitative and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OLI Variables Determining FDI in China.” *Review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13(2), 163-172.
- Hsiao, C., J. B. Nugent, and Y. Shen (2001),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s - A Reconciliation of Cross-sectional and Panel Data Analysis.” Mimeo.
- Hsiao, Cheng and Victor Gastanaga (2001), “Factors Affe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With Analysis of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Cost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Review of Pacific Bas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Policies*, 4(4), 479-493.

- Huang, Fanzhang (1995), "China's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and the Related Policie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6(2), 217-232.
- Huang, Jr-Tsung (2004), "Spillover from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Investment and from Other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ese Industrie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2(1), 13-25.
- Hymer, S. (1976),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Cambridge, MIT press.
- Jeon, Y. D. (1992), "The Determinants of Kore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28, 527-541.
- Korbrin, S. J. (1979), "Political Risk: A Review of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1), 67-80.
-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3), 483-499.
- Kumar, N. (1994), "Determinants of Export Orientation of Foreign Production by US Multinational: an Inter-Country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5(1), 141-156.
- Kuo, C.C. and J. T. Huang, (2003), "A Regional Analysi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ward Mainland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Pacific Rim Conference, January 9-12. 2003.
- Liu, X. M., H. Y. Song, Y. Q. Wei, and P. Romilly (1997),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Panel Data Analysi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33(2), 313-329.
- Lucas, R. B. (1993), "On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World Development*, 21, 391-406.
- Moore, M. O. (1993), "Determinants of German Manufacturing Direct Investment: 1980-1988."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29, 120-137.
- Pain, N. (1993),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0(1), 1-23.
- Pain, N. (1997), "Continental Drift: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U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anchester School Supplement*, 65, 94-117.

- Pitelis, C. (1996), "Effect Demand, Outward Investment and the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3(2), 192-206.
- Solocha, A. and M. D. Sokin (1990),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ase of Canadia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30, 371-86.
- Sun, Q., W. Tong, and Q. Yu (2002),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ross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1, 79-113.
- Tallman, S. B. (1988), "Home Country Political Risk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2), 219-34.
- Vernon, R. (196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0, 190-207.
- Walia, T. S. (1976),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Selected Theori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U.S. Base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 Wang, Z. and N. J. Swain (1995),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ransforming Economic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Hungary and China."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31(2), 359-382.
- Wei, S. J. (199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in Ito, T. and Krueger, A.O. (eds), *Financial Deregul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NBER-East Asia Seminar on Economics, Vol. 5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heeler, D. and A. Mody (1992),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ocational Decisions: the Case of US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3, 57-76.
- Zhang, K. H. (2000), "Why Is US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So Small?"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18(1), 82-94.